

## 論文摘要

本論文主題為「從『善治』論中國漸進式改革」，全文大約 19 萬字，研究界線定於 1978 年鄧小平在 11 屆 3 中全面宣布實施改革開放至今，主要是從「善治」角度，看中國漸進式改革的發展及其顯示的意旨。在研究動機方面，首先著眼於兩方面，一是，「治理」(governance) 已取代「統治」(government)，成為研究政治發展學門新趨勢。從國家層面看，「治理」的良善與否，已成為一個國家是否走向「善治」(good governance) 的指標。在「治理」逐漸代替「統治」成為判斷國家政治、經濟、社會發展過程與變遷衡量標準之際，我們的研究主體——中國，如何看待「治理」？中國的「治理」標準為何？中國透過什麼「治理」模式，達到改革進程與目標？同時，中國的國家治理，能否走向「善治」？這些主題，成為本文第一個主要的研究動機。二是，「中國漸進式改革」模式究竟意味什麼？在中國經歷 30 年改革開放、經濟日益崛起，及面對 1997 年及 2008 年兩次金融風暴仍能採取穩健措施率先各國經濟復甦；被外界稱為「具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路線」究竟是什麼模式？這一模式如何從自身內部汲取養份向外沿擴散，另一方面又如何從外部獲取資源「為我所用」？這些問題，都促使筆者希望藉研究過程，獲致解答。

在研究目的方面，可歸納為兩方面：其一，探究「治理」論述之意涵，了解中國如何看待「治理」，及從政治、經濟、社會發展進程，了解中國治理論述的現實意義。其二，對「中國漸進式改革模式」做出探討。重點為，中國漸進式改革的內外動力為何？從中國治理論述觀察中國改革發展在政治、經濟及社會三方面的體現；中國的國家治理政策，如何導致中國國家整體改革的變遷；最後，就中國漸進式改革的目的及目標做出探討，即中國的治理與改革是否能導致「善治」。

1978 年中共 13 屆三中全會後，鄧小平決心發展中國的經濟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，開啟中國治理新時代，對中國整體改革而言，「經濟建設」無疑是「綱」，經濟發展到一個階段後，政治體制改革、包括國務院機構改革、地方政府體制創新、選舉制度等，就提上改革進程。近年來，中共國家主席胡錦濤多次強調，推進法治社會，培育公民社會觀點，從經濟、政治到社會三方面的重點改革，就如同「綱舉目張」，皆是達到「善治」的主要方式及目標。

在研究方法上，本論文採取的有三種方法：一為文獻分析法 (document analysis method)，透過資料整理搜集、鑒別，包括大量官方文件、政府法規文書、政府工作報告、大會紀錄、國務院公報、黨大會文件、官方新聞發布會及學者論述等，形成科學認識的方法，從中找出改革開放過程中，領導人面對國家治理如何提出「漸進式改革」的政策依據，並從中歸納出漸進式改革過程中，採取什麼政策，以朝「善治」的方向發展；其次，採取歷史研究法 (historical research method)，處理論文意涵的解釋。由於本文擬從「善治」檢視中國漸進式改革內涵及發展，因此，將觸及大陸從「專制」到「法制」，從「人治」到「法治」，從

「威權社會」到「公民社會」，從「中國特色」到「國際慣例」的歷史論述，從歷史脈絡中尋找佐證，並進行歷史解釋，遵循歷史研究法較為適切；其三，採取「訪談研究法」(interviews research method)，在章節最後附上專家學者訪談結果，藉此佐證論文觀點。

在研究途徑上，本文採取的研究途徑包括：一，新制度主義研究途徑；隨著中國改革開放進一步深化，制度建設的重要性日益突顯，不管經濟、政治或社會都朝制度化方向發展，新制度主義遂成為中國問題專家或學者研究主要途徑。二，政經轉型研究途徑；新制度主義研究途徑，是既重視行動者，但又將其擺在制度脈絡中研究，強調制度本身重要的引導因素，但「政經轉型研究途徑」更看重宏觀與結構性因素。這一研究途徑是著重政治變遷過程所可能涉及因素的變動，因此，也打破傳統政治學、經濟學，或其他社會科學傳統領域的分工，而將轉型看作是一個總體現象，而產生這一總體現象的各個環境，都相互制約與相互影響。換言之，即是一種全局性的分析，其中包括經濟、社會、文化、政治等因素，都很難切割，都互為因果或條件。三，結構功能途徑；考慮到中國經過 30 年改革開放後，如今政經社會已進入趨向均衡、穩定、和諧與整合的「太平盛世」階段，因此，從結構功能學派提倡的靜態角態分析中國社會發展，似有其必要。建立一個平等、互助、協調的和諧社會一直是人類追求的美好願望，中國自古便有「大同社會」說法，西方也提出「理想國」境界，但社會和諧本身是「常態」或「非常態」，至今仍有紛歧，反應到社會科學中，就演變出結構功能主義及傳統衝突論兩種不同的範式。本論文擬從帕森斯 (Talcott Parson) 提出的結構功能途徑，探討中國政經及社會發展的適應與整合能力。

論文整體架構上，本論文依論述需求總計分為六大章，依序如下。第一章緒論，內分四節分別為研究動機與目的，研究方法與途徑，研究限制與假設，以及文獻探討。第二章探討「治理之論述」，共四小節，分為政治篇之觀點，經濟篇之觀點，社會篇之觀點，以及小結。第三章主要探討中國漸進式改革之理論與實際，按本章需要分節如下，第一節是「中國模式」之政經意涵，第二節為「自發性」改革之內在動因，第三節為「被迫性」改革之外在動因，第四節小結；第四章主題是「治理影響中國改革進程」，區分為政治面之影響，經濟面之影響，社會面之影響，以及與國際之合作—以應對「金融危機」為例。第五章談及的是「善治」之評估，重點放在中國「公民社會」之浮現，「善政」邁向「善治」之路徑，中國「善治」之具體成就與困境，最後是小結。第六章結部分，則分為兩部分說明，一是再論「中國模式」，二是談「善治」的最終目標—價值重建。

本論文的主要創見在於，藉由中國大陸學者提出之相關「善治」指標，創見了一個具體而微的「中國善治指標系統評分矩陣圖」，藉其橫向指標包括：中央政府、地方政府、黨委機構、企業組織、民間組織、新聞媒體等，及縱向指標包括透明、法治、責任、專業、公正、民主、廉潔、創新、執行力及回應力，以電話訪談大陸學者及公眾意見，得出綜合評分，再藉由綜合評分，分析大陸各階層

領域的「善治」發展進程；與此同時，在第五章第三節探討中國「善治」之具體成就與困境時，也藉新創的善治指標系統，評估本論文在政治、經濟及社會三大領域提出的相關案例綜合評分，同樣藉此審視大陸各層面的「善治」進程。

最後，論文透過結論部分說明價值信仰重建的關鍵性及重要性。論文認為，一，中國能取得今日成就，中華傳統文化扮演重要角色；二，中國古典文化及中國現代化社會主義兩者結合，是中國最基本的軟實力資源；三，近年出現「國學熱」即在弘揚傳統文化；四，「北京共識」提出者、高盛公司經濟顧問雷默（Joshua Cooper Ramo）認為，「中國模式」已揭示中國文化的實踐理性特質；五，胡錦濤強調「和諧社會」，即源於中華文化的「中道和諧」觀。

從以上論述可知，中共建政初期及「文革」時期，雖然繼承了馬克斯主義，宣稱將中國傳統文化拋諸腦後，但 1978 年改革開放後，實際上是走向一條逐步恢復中華文化傳統的道路，尤其近年經濟崛起後，中國在海外廣建「孔子學院」，「國學熱」在內地的紅火，都表明官方已重新重視傳統文化的宣揚，並有逐漸將其拉高到社會及國家信仰再造層次之意味。

這在在說明，文化與中國「善治」具有高度的關聯性，一方面是理性工具，國家要達到「善治」，就不能缺乏信仰與價值體系，如此才能可長可遠；另一方面是工具理性，即只有透過傳統文化，融合中國五千年歷史價值，才能降低世人對中國共產黨的敵意，才能逐漸形成和平民主與文明進步的形象。